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汉魏六朝文选

宋绪连 陈义成 陈崇宁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汉魏六朝文选

宋绪连 陈义成 陈崇宁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汉魏六朝文选 / 宋绪连等选注.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 汉... II . 宋... III .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I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170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汉魏六朝文选

宋绪连 陈义成 陈崇宁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272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680-145-6 / I·079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炯 傅璇琮
主编 乔力
副主编 邵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岚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宋 磊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序

乔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 40 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 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散文长河中，两汉散文是继先秦之后继续发展和提高的阶段，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古代散文发生重大演变的时期。

一

两汉散文继承先秦“尚用”的传统，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

从《汉书·陆贾传》的记载可知，当刘邦明白马上得天下却未必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后，向陆贾提出总结“秦所以失天下”的教训的要求，以为新王朝提供统治良策。于是，深刻总结秦代短期而亡的历史经验，便成为西汉前期的政治主题，也是西汉前期政论文的中心意旨。这时期最著名的政论文，是贾谊的《陈政事疏》（又名《论治安策》）和《过秦论》。《陈政事疏》是因匈奴入寇而上文帝的奏疏，针对当时“天下初定，制度疏阔”，面临危险的局势，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本业”、“贵礼仪”等系列对策，显示出贾谊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治国才能。《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最为出色，阐述威震四海的强秦由于实行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等错误政策，导致短期而亡的惨局，其要害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确如鲁迅所说：“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汉文学史纲要》）。晁错的政论文《论贵粟

疏》、《守边劝农疏》等，都是为议政而作的名篇。在《论贵粟疏》中，晁错不仅论述了重农贵粟的重要意义，而且提出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具体措施，强调只要“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就会达到社会安定。“其以劝农、贵粟为中轴，而将事物的两面，两两相比，一路比去，直比出一条解救时弊的通道来。”^① 可谓内容沉实切要，“行文极有法度”（林纾选评《古文平辞类纂》卷三）。

所谓“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几篇贤良对策尽是“天人感应”之类的内容，较少文学价值。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作为辞赋家将辞赋的艺术手段用于散文，渊雅富丽，颇有文采。《狱中上梁王书》、《难蜀父老》和《谕巴蜀檄》都是以赋为文，铺排描写，引证古今，表现追求对偶工整的审美趋向。

这时期，司马迁的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史记》不仅是史学名著，而且还是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以人为本位，以“纪传”为主的史学新体，生动描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摆脱了《左传》、《战国策》以记述社会上层人物、政治人物为主的局限性，各个阶级、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全方位地展现出活生生的宏伟的历史画卷。与先秦史家的那种史学性的叙述态度完全不同，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之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的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② 《史记》是司马迁“抒其愤”（《报任安书》）的杰作，通过各种方式抒发自己的褒贬爱憎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是前此历史散文所不具备

① 刘毓庆著《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96页，第382页。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二编第二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许即有感于此。试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司马迁在记叙传主“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史实时，曾议论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其实是司马迁“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马三人合传读可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屈原贾生列传》）《史记》中的历史人物，既是历史“实录”，又是文学虚构，既是凝固的历史生活的再现，又是活脱脱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无愧为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善于以典型事例表现人物的基本形象，以“分写法”保存人物的完整形象，用个性化语言突出人物个性，在典型环境中揭示人物性格，用心理描写增强形象的生动感，用细节描写增强形象的逼真感，采写奇闻轶事增加人物的传奇色彩，用对比衬托强化人物个性形象，借传中人之口评断人物，故而塑造出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群象。例如，在《项羽本纪》中，选取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三个重要事件，以表现项羽叱咤风云、骁勇无敌、豪壮坦荡的性格；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将廉、蔺置于秦赵斗争和内部矛盾的漩涡，详写蔺相如，略写廉颇，错综离合，变化无迹；在《李将军列传》中，通过传主与无德无才而平步青云的李蔡对比，揭示李广怀才不遇的遭遇及其社会根源，通过与严格治军的程不识的对比，显现李广简易治军的大将风范；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魏其、灌夫称武安侯时曰丞相，时曰将军，以个性化语言写活了人物。钱钟书先生为此评论说：“武安固自‘以为汉相尊’，乃至‘负贵’而骄己之兄者，灌夫与人语，亦从而‘丞相’武安，及武安对面，则恃旧而不改口，未以其亲贵而生新敬，若不知其已进位为相者……夫私家寻常酬答，局外事后只传闻大略而已，乌能口角语脉以至称呼致曲

入细如是？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造。”^①

总之，《史记》开创的以纪传体述史，为后代史家立下不易之法，众多而成功的人物传记又成为后世传记散文写作的典范，它的简洁淳朴、从容流畅的散文风格，一直为唐宋古文革新家所推崇，在中国史传散文的发展史上是一座高耸的丰碑。

西汉后期散文，以桓宽和刘向为代表作家。桓宽的《盐铁论》，根据讨论盐铁问题的会议记录加工润色而成，富有现实性。以记录贤良、文学同桑弘羊论辩、诘难的方式，让双方的论点充分展开，即王充所谓“两刃相割”、“二论相订”（《论衡·案书》），是颇有特色的政论散文。刘向的散文有两类，一类如《说苑》、《新序》、《列女传》等采自先秦典籍和民间传说，属于历史故事，一类是给皇帝的奏疏和校书的叙录，代表了董仲舒之后的汉儒正统文风。

东汉前期散文，较为重要的是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体例大都以《汉书》为楷模。全书共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一百篇，一百二十卷。从传记文学角度看，《汉书》和《史记》相较虽“略输文采”，但亦有不少传世名篇。《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所附《苏武传》即是佼佼者。传记描述苏武拘于匈奴十九年中，不畏刀剑相逼，不为情理相诱的动人事迹，歌颂刚毅勇敢的英雄品格和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善于运用具体的细节描写，以“卧而啮雪”、“节旄尽落”等揭示苏武的精神风貌。在痛斥“背主叛亲”一段，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揭露卫律媚敌求荣的无耻行径，表现苏武忠君报国的浩然正气。还用李陵劝降未成、羞愧泣别作侧面衬托，以突出苏武的崇高形象。苏武作为传记文学的人物形象，足以与司马迁笔下诸多形象相媲美。

《汉书》的人物传记，多从文献角度采录学术事迹和经术文章、

^① 钱钟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第347页。

诗赋,这使《汉书》更具学术文献价值,没有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大。关于《史》、《汉》文章风格,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茅坤说:“《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镬胜。”(《刻汉书评林序》)司马迁的《史记》充满精神气血,发于情、肆于心,慷慨壮阔,雄逸恣肆。班固的《汉书》虽个别篇章有似司马迁处,但从总体审视,则是尔雅深厚,有儒者之风。在语言上,《史记》朴实自然,力求散文化、个性化、口语化;而《汉书》崇尚典雅,讲究藻饰,力求凝炼工丽,反映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审美走向。

《论衡》写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这期间,皇帝钦定经义,把一套谶纬迷信的货色和“天人感应”的学说钦定为“国宪”,致使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神学思想弥漫文坛。在这样的大背景织下,继思想家桓谭之后,王充以其《论衡》坚持“真美”为原则,勇敢地批驳“虚妄”之说,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订鬼》篇专论鬼神问题,明确指出:鬼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精念存想”的幻觉,人们病态的主观意念。王充对神学迷信的这种深刻批判,在经学僵化和谶纬泛滥的时代,“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意识革命,从而促成了无神论思想主导地位的恢复。”^① 王充的论述简朴明快,稍乏文采。尽管这样,我们不能不看到:《论衡》的出现“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②

东汉后期,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等是有代表性的政论。这些政论,针砭时弊有余而文辞巧丽不足。

^① 漆绪邦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450页。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57页。

蔡邕的《郭有道碑》、李固的《遗黄琼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等，倒是值得重视的散文名篇。《郭有道碑》在概述郭泰品德一节中，句式整齐匀称，几乎都是骈句，音韵铿锵。这种缀采雅泽明显趋于骈化的文章，实为六朝骈俪风气的先声。王闿运曾指出：“骈丽之文起于东汉”（《湘绮楼论文》），验之以蔡邕等人散文佳构，此论可谓确切无疑。

二

持续三百六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深厚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得到了很大发展，发生重大演变。概括地说，魏晋南北朝散文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如下特点：

（1）随着对文学特征的认识逐渐明晰，散文创作取得长足进步。

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到沈约的“以情纬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正从汉儒片面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转向重视抒写真情实感，“述志为本”、“为情而造文”（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由于对文学以情动人的特性的认识有所深化，散文作品一扫过去的教化、讽谏之旨，代之以慷慨悲歌与哀怨之音，呈现出崭新的文学风貌。

试读魏晋南北朝大量的抒情言志性散文，便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曹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招致朝野谤议之际，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颁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申明“身为宰相”“意望已过”，唯辅佐汉室，为国建功，并无

代汉自立之想。可以奉还大部分食邑，却不能交出军权。直言不讳地自明心志，倾吐苦衷，真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大家风度。这种在思想上打破儒家观念传统，在文章上洗净汉儒的典雅习气的清峻通脱文风，对魏晋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曹丕的散文包括书和论两类文章。《与吴质书》是一篇富有抒情性的论文书札。信中深情地回忆当年与陈琳、王粲等新近去世的作家一起宴游、赋诗的美好情景和亲密友谊，并对建安诸子的文学成就作出公允的评论。此“书”多为散行，兼用骈语，对后世短篇抒情散文有过积极影响。他的《典论·论文》肯定文章具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能和价值，鼓励作家从事文学活动，对魏晋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明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曹植的散文和他的一生经历密切相关。《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是其优秀的散文作品。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倾述自己的政治抱负，表现出自视甚高的性格。其抒写怀抱，充满激情；讥弹时人，笔锋犀利，是一篇具有浓烈抒情气息的书札。

建安七子中，孔融以散文著称，其《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是“慨然有烈丈夫之风”的散文作品。

魏晋之际抒情言志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妙文。此“书”并非仅为“绝交”而写，实质上等于不同司马氏合作的公开声明，反传统礼教的战斗宣言。以“七不堪”、“二甚不可”表达不愿出仕的坚定立场和果决态度，抨击假借礼法之名阴谋篡夺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挥洒自如，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具曹操通脱之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以为超世独往、与道合一的“大人先生”立传的方式，激烈抨击虚伪的名教，讽刺礼法之士的迂腐可笑。将礼法之士比作裤中之虱，形象地再现了所谓“君子”者流守礼求荣吃人帮凶的丑态，笔锋犀利，痛快淋漓。

东晋陶渊明的散文，首推《桃花源记》。原为五言古诗《桃花源

诗》前的一篇小记，因其影响甚大，往往单独成篇。文中描绘了一个与晋宋社会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对《诗经》以来渴望“乐土”世界的思想和阮籍、鲍敬言等“无君”论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史和散文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五柳先生传》，虽名曰“传”，却有别于一般史传，不记传主姓名、爵里、生平仕途、功德事业，只记述五柳先生读书、饮酒、著文的志趣，这其实是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一篇咏志抒怀的文章。语言简洁省净，于平淡中见真淳，于自然中现情趣。

（2）随着对自然美的认识逐渐深化，山水写景散文不断发展。

先秦至魏晋，涉及山水景物的散文并不少，然而，它们并没有把自然景物作为审美对象来描写，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山水写景散文。东汉马第伯有一篇《封禅仪记》，第一次将山川景物大幅度搬入散文，但他笔下的泰山景物还只是封禅大典的背景陪衬，仍然缺少山水写景散文的独立品格。在汉帝国大一统政权崩溃、儒家思想禁锢被冲破之后，玄学思潮乘隙而起。魏晋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自然，到晋宋时期山水审美意识开始明晰起来。应该说，有了明晰的山水审美意识，才带动了山水写景散文蓬勃发展的新景观。

东晋的山水写景散文，主要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释慧远的《庐山记》、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等。《兰亭集序》描述东晋名士“游目骋怀”于山水之美和流觞赋诗的欢乐情景，表达了对人生的深深眷恋。它是东晋文人山水审美意识逐渐明晰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南朝山水写景散文，主要有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它们或记游踪，或述幽居，从动态、静态、色彩众多角度再现江南山川的明丽风光，抒写“息心忘俗”崇尚自然的情趣，显示了自然美意识的成熟和艺

术表现力的高超。如果说东晋山水写景散文中还弥漫着浓厚的玄理烟雾的话,那么,从鲍照开始的南朝山水写景散文则已全方位呈现出自然美的“庐山真面目”了。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堪称南北朝时期山水写景散文集大成的著作。它记载了一千三百五十二条大小河道水道,描述了两岸的山川形胜、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尤其以优美的文笔展现了祖国锦绣山河的雄伟秀丽的姿容,在我国山水写景散文的发展史上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刘熙载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艺概·文概》)这个评价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

(3)随着对形式美的不断探求,骈文业已成体,并且迅猛发展。

骈偶,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法早在原始歌谣、《易》卦爻辞、《尚书》誓诰中已经出现了,可以说,它与古代文学同时诞生。但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则萌芽于两汉,形成于魏晋,极盛于南北朝。汉初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遣词瑰玮,多用偶句,是“骈体文之渐萌”(《四库提要·四六法海》)。东汉蔡邕的《郭有道碑》几乎全用骈句,纯乎为骈文立格,实属罕见。两汉文章的对偶运用均系自然形成,尚未达到刻意经营的程度,总的来说文章还是散体为主,时或骈散交错,骈文并未独立成体。到了魏晋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关注形式美,讲究藻饰,已经蔚为风气。曹植的《求自试表》、《与吴质书》、吴质的《答东阿王书》等,可视为骈文的先导。西晋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荐戴渊疏》等已是成熟的骈文。就连文学论文《文赋》论写作方法,亦用骈词俪句铺排陈说。东晋刘琨的《答卢谌书》,以书信体骈文抒写英雄气概。鲍敬言的《无君论》,以大量偶句抨击封建君主制度。刘宋时期,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又是较早以书信形式完成的山水写景的骈文。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以骈体记人叙事,神情毕肖,亲切感人。他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使事用典,工丽妥帖,全